

目 次

印地语文学的八十年	西沃丹·辛赫·觉杭
序 言——印地语文学史的问题	(3)
一 印地语文学的背景	(19)
二 诗歌的发展	(44)
三 戏剧的发展	(118)
四 长篇小说的发展	(140)
五 短篇小说的发展	(167)
六 散文的发展	(185)
七 文学批评的发展	(197)
八 新的发展前途	(207)

论普列姆昌德

普列姆昌德的一生	拉默·维拉斯·谢尔马 (213)
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艺术	伯勒迦谢金德尔·古伯德 (228)
论《戈丹》	伯勒迦谢金德尔·古伯德 (241)
短篇小说家普列姆昌德	伯勒迦谢金德尔·古伯德 (251)
普列姆昌德的民族精神	德利罗基·那拉因·蒂契德 (262)
编辑、思想家、批评家	拉默·维拉斯·谢尔马 (278)

论伯勒萨德

伯勒萨德的生平介绍·····	默泽因德尔·修格尔	(299)
伯勒萨德的诗歌简介·····	格利生德沃·谢尔马	(305)
戏剧家伯勒萨德·····	拉默古马尔·古伯德	(315)
伯勒萨德的长篇小说的一般特点 ·····	苏西拉·德维、维姆拉·德维	(326)
伯勒萨德的短篇小说的一般特点 ·····	苏西拉·德维、维姆拉·德维	(336)
文学中人民生活的基础和伯勒萨德 ·····	拉默·维拉斯·谢尔马	(344)
编译后记·····		(360)

印地语文学的八十年

西沃丹·辛赫·觉杭

序 言

印地语文学史的问题

印地语文学史专家在双重意义上使用印地语这个名词，因而使头脑清醒的学文学史的学生产生许多疑难。当他们写早期和中古^①的印地语文学史的时候，将拉杰斯坦语、迈提里语、阿沃提语和伯勒杰语等印度北部、东部和中部通行的大约十来种语言和方言的古代文学，以及口头流传下来的民间诗歌，通通写了进去^②。他们似乎认为：印地语并不是某一种语言的名字，而是从萧勒塞尼和半摩竭陀等俗语到九、十世纪之间发展起来的各种地方性语言的总名称。在这些语言中，有时某种语言或方言很流行，

① 本书中“中古”一词，作者是和中世纪混用的，这是因袭了欧洲人的习惯。中古或中世纪在印度一般是指十一至十九世纪。——译者注

② 一般的印地语文学史著作认为印地语文学开始于十世纪左右，即梵文和俗语文学已经衰落，各种地方性语言的文学形成的时候，故包括了将近一千年北方的各种语言和方言的文学史，应该说这是广义的印地语文学史。本书作者不同意，认为印地语只是许多语言中之一种，只是德里附近的通行口语即所谓克利方言用梵文天城体字母和吸收梵文词汇的书面语言，还有另一种用波斯体阿拉伯字母写下来的并吸收波斯语词汇的书面语是乌尔都语。作者认为印地语文学史的概念只能是克利方言梵文体书面语的文学史，应该说这是狭义的印地语文学史。作者在序言以及论述背景时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使用印地语这个词有时是广义，一般都指克利方言。——译者注

有时却又是另外一种。结果，坐上文学宝座的语言有时是拉杰斯坦语，有时是迈提里语，还有时是阿沃提语或伯勒杰语。这样，他们狂热地将这片广大地区的当前各种不同语言的文学史集中写进一本书里，从而易于全面说明从八、九世纪起印地语文学创作的不间断的潮流。但是，当他们提笔写现代或当代的文学史时，他们狂热的中心却又改变了。一接触到现代文学，他们突然又不肯接受伯勒杰语、阿沃提语、迈提里语和拉杰斯坦语等语言中随着传统而发展下来的当前各种文学创作活动。他们甚至对用克利方言写下来的每一个告示、文献或指令都进行搜集，对每一点微小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以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狂热加以阐述，可是对这广大地区的其他各种语言和方言中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却一概置之不理。如果由于现代的几位伯勒杰语诗人的才华和作品，使得他们对这些诗人不得不在文学史中加以阐述的话，那他们也是将这些诗人的作品作为一种正在消失的封建时期传统的残余来说明，也就是说把他们作为保守的传统法式主义^①的诗人，认为他们由于陈旧的思想意识，不能面向现代的新问题，不能把自己置身于现代的思潮之中，没有能力运用克利方言来作为自己写诗的工具^②。当他们从帕勒登杜时期和十九世纪末逐渐写到二十世纪时，对“反”时代潮流的伯勒杰语诗人的阐述就更少了。于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克利方言的梵文体形式成了“印地语”的独

① 一般的印地语文学史的著作，将十七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的文学，称作法式主义的文学，称这个时期为法式时期。这个时期的诗歌多为王公消遣娱乐的低级趣味和庸俗的作品，而在形式上则追求词藻的华丽和新鲜。——译者注

② 实际情况是：伯勒杰语的诗中最先表现了现代的各种问题和思想感情。巴勒格利生·占伯德、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伯德利·那拉因·伯列默肯、伯勒达伯·那拉因·米谢尔等诗人用伯勒杰语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写了诗，诗中表现了尽忠、社会改革以及爱国主义等新题材。——原注

一无二的同义语。狂热的风气仅仅关注这一形式。当前印地语系中其他语言和方言里所创作的文学，在文学史著作中没有得到系统的阐明。有些人把那些语言和方言的诗人从创作正统文学作品的诗人行列中排除，而将他们放在民间诗人或农村诗人的行列里。即使如此，在文学史上还是认为他们不值得一提。当前印度北方各个大学里的研究工作，就是按照这种被认可的方式进行的。

总之，直到现代以前，我们写的是印地语系的文学史（虽然对每一种语言的文学发展过程仍然没有分别加以系统地阐明，可是还是将这些语言所有已知的和发现了的文学作品，全面地叙述在印地语文学的传统之内）。但是，一接触到现代，我们却开始编写作为国语的印地语（克利方言的梵文体文学形式）的文学史了。开头，我们的狂热集中于说明印地语的传统古老和广泛，不能容忍印地语系中任何语言或方言的某一篇作品被排除在这个历史传统之外；但是，却又仅仅局限于克利方言的梵文体形式（连克利方言的波斯体“乌尔都”这个形式也没有包括在内）。一接触到现代，我们对印地语系中其他语言原有的敬仰突然消失得一千二净，甚至我们狂热到对于现在用这些语言和方言进行零星的创作也都感到不适宜。通过这些语言，印度历史上中古时期文化复兴的意识得以产生和扩大；也是这些语言通过自己的文学，艺术地反映了整个印度文化的理学、哲学、历史传说、思想传统和道德准则，并使其在各自的地区——一般说来在整个印度北部——为所有的人易于接受，而我们的文学史专家却断定这些语言完全不适用于表达现时代的民族意识、新思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质以及理论。这种欺人的手法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还从一种独出心裁的论证方式出发——或者说仅仅是由于自己的冲动——将伯勒杰语（因为伯勒杰语在现代时期开始时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所以实际上是暗中将这片广大地区的其他所

有的语言和方言)确定为封建观点的代表,并宣布它不宜用来进行文学创作;而认定克利方言(它完全没有僧侣诗、修士诗、英雄史诗、虔诚诗^①和法式诗等古老的传统,同时,到十八世纪末为止,或者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为止,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任何值得提到的诗体或非诗体的^②文学创作)是独一无二具有传播现代思想意识能力的语言^③。他们宣布伯勒杰语以及其他语言完全不适用于非诗体,却宣布克利方言生来就适用于非诗体。

这种编写文学史的风气是违反历史的,并且是武断的,其根源就是缺乏历史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种方式助长了狭隘的封建的观点,而不能在学文学的学生中发扬民主的观点。我们的文学史专家将自己的观点中许多矛盾的地方,统一起来时所凭借的一套论据是不理智的,是出于感情用事的,它会产生虚无的情绪和狭隘性。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文学史专家都以坚定不移的态度接受了这种非科学的观点,因而在这里我们不

① 僧侣诗和修士诗是指十一世纪前后带宗教色彩的诗歌;英雄史诗是指十三、四世纪前后歌颂抵抗外来侵略的人物的一些长篇叙事诗;虔诚诗是指十五、十六世纪反映了宗教改革思想的诗歌;皆为广义印地语文学史上重要文学倾向。——译者注

② 印度古代划分文学的体裁只有诗体和非诗体,诗体主要包括依诗律写下的作品;非诗体则指除诗体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到现代,诗体则只指诗歌,而非诗体则指戏剧、小说、散文等。在本书中为了避免和文章、散文等词混淆,故直译成诗体和非诗体,或韵文体和散文体。——译者注

③ 克利方言的波斯体乌尔都语形式,一直被印地语文学史专家排除在印地语文学史之外。他们既不承认乌尔都语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汇合而发展起来的印地语(克利方言)的一种必然的形式,而且也不承认它是印度的。他们认为乌尔都语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制造出来的,是在王朝的骄奢淫逸的风气中孕育发展的宫廷的语言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扼要地加以研究。这里我们只要注意到克利方言的这种波斯体的列克达语或乌尔都语形式中,除开十六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南印地”诗的传统外,

是针对某一个人。一种错误的方法已经流行，对此，我们有责任提醒读者们注意。早在权威的学者们着手研究印地语文学史以前很久，一方面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相互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而另一方面伯勒杰语和克利方言的争论也已经展开了。在那时候，争论的背后存在着政治的原因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的原因，这些原因使人民群众的见解局限于相互对立的狭隘观点和教条情绪的圈子里。结果，我们勤奋的学者和文学史专家的思想感情也受了这些流行的见解的影响。但是，文学史专家是科学家，历史的眼光并不会为一时流行的某些见解和教条所左右，而会为了揭示运动着的现实的历史进程和方向，努力深入那些直接可以看到的现象中存在的实际和内在的真理。这样，从人类向未来发展的角度说来，历史才是有意义的，能够指引我们的道路，否则，鼓励了不正常的观点，就会使我们的视野受到局限。如果一个文学史专家不能透过流行的见解和教条的外表去揭示真理，或者他本人就在自己的眼睛上戴上了那些教条的有色眼镜对历史进行歪曲，或

像沃里（谢默谢沃里·乌拉，死于1774年）、米尔（米尔穆罕默德·德基·米尔，1709—1809）、德尔德（克瓦加·米尔·德尔德，1715—1783）、纳基尔（沃里穆罕默德·纳基尔·阿格伯拉巴蒂，1740—1830）、藻格（谢克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藻格，1789—1854）、迦利布（米尔扎·阿斯德拉康·迦利布，1797—1869）、摩明（赫基默穆罕默德·摩明康·摩明，1800—1851）、阿米尔（阿米尔·阿赫默德阿米尔·米那伊，1828—1900）、达格（纳瓦伯·米尔扎康·达格，1831—1905）、阿扎德（谢默斯乌尔·乌勒马·毛勒维·穆罕默德胡散·阿扎德，1829—1910）、哈里（毛拉那·阿尔达弗胡散·哈里，1840—1916）和阿格伯尔（赛耶德·阿格伯尔胡散·阿格伯尔·伊拉哈巴蒂，1846—1921）等大诗人早在帕勒登社·赫利谢金德尔以前就奠定了诗歌的光荣传统的基础和创造了一种洗炼的非诗体风格。他们广泛而艺术地反映了十八、十九世纪全国性的动荡以及道义与精神生活中所笼罩的不平、痛苦、忧伤和危机，创立了人类的新的价值概念。在今天，他们中间的一些大诗人的抒情诗短章还为人们所喜爱，这些抒情诗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原注

者是只搜集了一些史实就万事大吉，这算得什么文学史专家呢？搜集史实是任何用功的学生都能做得到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简略地讨论一下流行的编写文学史的方法中出现的一些谬误，从而使我们的文学史能够摆脱我们在上面曾提到的一些矛盾。

首先，我们来看看印度北部和中部时而这一种时而那一种语言坐上文学宝座的问题。只要有一点关于人类各种语言史和文学史知识的任何人都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违反历史的逻辑，这种封建式的杜撰多么令人可笑。拿语言和帝王的朝代来对比难道有什么意义吗？我们知道，在封建时期德里的宝座曾被一个接着一个的王朝的帝王所占有，当一个王朝统治了一段时期被推翻了的时候，于是另一个朝代的帝王或伊斯兰教的苏丹又控制了政权。可是，人类的语言却不是像帝王朝代那样不稳定的因素，每一种语言总是为某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人所使用。因此，只要说这一种语言的人一天不被完全毁灭，那么这种语言也就要存在一天。所以，任何语言为了文学创作没有必要加冕或升上宝座。我们所有的文学史专家和学文学的学生都知道，印地语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有时这一种有时那一种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任何人也不能够将这些语言的一千多年的历史按照确定的日期划分开来，并说明这一种语言流行到某年某月为止，然后又是另一种语言担负起了表达印地语地区人民的各种问题与思想感情和感受的任务。然而这种杜撰却被用来当作论断，以便使这个地区的说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们承认：克利方言印地语是文学宝座的唯一继承者。但是，即使我们暂且肯定这种论断是正确的，那又怎么能够断言克利方言印地语今后会永远继续留在这文学宝座之上，而拉杰斯坦语、伯勒杰语、迈提里语、阿沃提语、婆杰布利语和崩德里语等其他语言中，就不会有某一种语言把它推翻而自己坐上文学宝座呢？难道人类的历史在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却证

明变化的规律是不真实的吗？难道拉杰斯坦人今天却不是在说拉杰斯坦语吗？难道伯勒杰人抛弃了自己家乡的语言，或者说比哈尔的人民已经忘记了迈提里语和婆杰布利语了？如果说没有，如果承认这个地区说各种不同语言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今天仍然在说自己家乡的语言是事实的话，那么明天它们中间就不会产生第二个金德·伯勒达伊、苏尔达斯、杜勒西达斯或维德亚伯蒂^①，从而使我们的文学史专家这样煞费苦心准备好的圈套不致于落空？怎么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但是，人们也许就是为了杜绝这种可能性而发明了另外一种反科学的论断，即其他语言不适用于创作非诗体文学作品。实际上，这种论断在这些地区的人中间，在使人们对自己家乡的语言产生虚无的想法方面相当成功。这些地区有些人在受完克利方言印地语很高的教育以后，在自己的老家为了表达自己自然而细微的感情还仍然是用自己家乡的语言；而为了用克利方言印地语很雅致地表达某种思想，即使在考虑适当的词汇时不得不绞尽脑汁，可是，他们还是按照这种已经广泛流传的见解，认为他们自己家乡的语言不适用于创作非诗体文学作品，不具备满足现代科学时代各种需要的表达能力，或者说没有创作高级艺术品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和文学批评的能力。

真实的情况是：在八世纪至十世纪间，由于中古时期的混乱和文化衰落，千百年来作为文学语言的梵语的束缚松弛下来时，各种俗语按照各地的情况和民族生活的文化传统发展起来了，从

^① 这四人都都是广义的印地语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金德·伯勒达伊是十三世纪前后的诗人，其主要作品相传是英雄史诗《地王颂》，苏尔达斯是十六世纪的诗人，其主要作品是《苏尔诗海》，杜勒西达斯是十六、七世纪的诗人，其主要作品是《罗摩功行录》，维德亚伯蒂据说是十五世纪的诗人，其作品多为抒情诗。——译者注

而使印度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各个地区的语言和方言的现代结构形式得以稳定下来。十一、十二世纪间，由于在印度北部和德里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印度人接触到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时，部分由于受其冲击而产生了动力，部分由于反对当时印度教社会的保守和束缚而在内部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国内的人民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动荡和文化复兴的浪潮。在几百年中，这个浪潮席卷了整个印度，从而更便于由俗语发展起来的各个地区的语言巩固各自特有的现代形式。这种全国性的文化复兴产生的结果是：各个地区的诗人将自己本地区的语言变成了写诗和创作文学作品的工具，英雄史诗、修士诗和虔诚诗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明。这个过程从克什米尔直到古加拉特、马哈拉施特拉、孟加拉和阿萨姆，几乎是同一时期开始的。在南部的达罗毗荼的各种语言中^①，没有间断过的文学创作的传统从很古的时期就一直继承了下来，也就是说，那里的文学语言一直都是当地的语言。所以那里没有发生过这种语言革新，文化复兴只表现在诗歌的倾向和思想潮流的范围以内。从那时候起，所有各种语言中文学创作就一直连续不断。只是由于外部的种种政治和文化的的原因，这种创作潮流的速度即使在一个时期变得很缓慢，或者因为外部的引诱，一些有才华的诗人，在取得王朝的庇护或从王朝那里得到承认和方便以后，用其他地区的语言写了诗，而没有提笔来丰富自己本地区的语言，可是也从来还没有出现过——从历史主义的眼光看来也决不可能——某一种语言中文学创作的潮流曾经完全停止的情况。语言是一种经常性的潮流，其使用者即使被剥夺了创作很典雅的文学作品的各种有利条件，可是为了满足自己社会生活的种种文

^① 印度的许多种语言中有属于印欧语系的；有不属于印欧语系的。南方的达罗毗荼语就不属印欧语系，它包括印度南部的泰米尔语、马拉雅兰语、泰鲁固语和坎拿地语。——译者注

化的需要，还是不停地在创作文学作品。因此，当伯勒杰语很流行的时候，特别是在印度教的各个王公的朝廷里只有用伯勒杰语写诗的诗人才受到重视的时候，如果以为在说拉杰斯坦语或近提里语的地区就没有任何诗人在写诗，这也是错误的。同时我们知道，当今天只有克利方言印地语受到鼓励，也只有它得到了作为教育的工具、出版和宣传等便利条件，而所有其他各种语言中诗的创作仍然在各个地区进行。毫无疑问，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大多数有才能的作家，由于外部的种种引诱，不用自己的地方语言进行写作，而被吸引到克利方言印地语方面来了，就像有一个时期他们被吸引到英语方面一样。但是，其他一些语言中文学创作的潮流并没有停止，文学创作的前景并没有消失。可是，文学史专家却仍然不愿提到这些。

各种语言的发展不会是相同的，正如各个民族的发展不相同一样。各个民族按照时间、地点的各种条件和自己历史的、生活的发展进程——还包括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种条件——而发展。同时，人类学的学生也知道，人类的各种语言就反映这个发展进程，也就是说，在各种语言史的基础上，可以确切地推测出说这些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发展。因此，如果说某种语言缺乏表达能力，另外某种语言具有更强的表达能力，则是愚蠢的。最多只能说某种语言落后于时代，或者说由于说这种语言的人们文化落后，不能反映现代科学和工业社会的各种特殊行动、思潮、感情或事物。但是，要是说它的表达能力将永远会受到限制，这就等于说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永远不会发展。因此，正如人类学不承认在人类各个民族间有什么高低优劣的区别一样，语言学也不承认各种语言之间有这样的区别。任何一种语言并不比其他语言低劣，任何语言也并非天生就有能更细致表达的能力。随着生活的实践、相互的合作、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发展，语言

的表达能力也必然会不断地发展。因此，不可能有某一种语言天生就不适用于非诗体文学，实际上，真实情况恰好完全和这相反。说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为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交流思想，总是使用语言的非诗体形式。一种口头使用的语言，它也可以被写下来，也可能有象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一样的天才作家使用它进行创作而获得成功。当然，在得到国家所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以后，现在克利方言印地语的全面发展是可能的了。但是，拉杰斯坦人、比哈尔人、阿沃特人或伯勒杰人的文化水平比起默勒特人和德里人来并没有象他们的语言和克利方言印地语比较起来在现代文学的发展方面那么落后，实际上，文化水平完全没有落后。关于克什米尔语，我可以说说我亲身的感受。就在五年以前，还没有人用克什米尔语写过非诗体的作品，虽然那里的诗人们从十四世纪起，在没有王朝的庇护和没有出版的便利等条件下，还是用克什米尔语不间断地写诗。因此，当我们以民族文化大会的名义出版了《大会会刊》时，最初，刊登在上面的诗倒是用克什米尔语写的，但是不得不用当地官方语言乌尔都语来刊登文章和短篇小说。在我的倡议之下几个作家用克什米尔语写了短篇小说、剧本和文章，从正常的非诗体和技巧的角度来说，这些东西比乌尔都语的作品写得更好，因为运用自己家乡的语言，使这些作家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艺术地表现自己才华的手段。他们自己也因写作的成功而感到惊异。同时，当畏缩一旦消除，那他们就产生了无限的热情。如果他们能得到适宜的机会和各种便利条件，谁能断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会象提到古加拉蒂语、马拉提语、泰米尔语或孟加拉语等语言的长篇小说和剧本那样，骄傲地提到克什米尔语的长篇小说和剧本呢？因此，不能说这些语言的表达能力比克利方言印地语就弱一些，也不能说不可用它们创作现代风格的非诗体文学作品。因为比较起来，说这些语言的人的思想水平并不低，

他们的感受并不肤浅。在得到适宜的机会和各种方便条件以后，在作为教育、出版的工具以后，所有这些语言在发展现代非诗体文学方面也许并不需要一两代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的文学史专家由于抱有偏见和先入为主要的观点而一直无视这些可能性。

消除了这些有关文学史的错误以后，产生的问题是：印地语文学史从哪儿开始呢？它的范围有多广呢？也就是说，到底按不按照当前流行的方式将克利方言印地语以外的其他印度北部、中部的语言的文学史也包括在印地语文学史之中呢？如果包括进去，又该采取什么方式呢？如果不包括进去，那么，印地语文学史在没有金德·伯勒达伊、格比尔达斯、加耶西、维德亚伯蒂、苏尔达斯、杜勒西达斯、米拉巴伊、格谢沃达斯、普生、默蒂拉默、比哈利、德沃、伯德马格尔、克那南德和勒德那格尔^①等诗人的情况下难道不是显得微不足道了吗？

幸而这种人为的害怕印地语文学史显得微不足道的情绪并没有能吓倒我们。我们知道，在竞争国语的地位的时候，和乌尔都语比较起来，为了使人同意克利方言印地语的权利，为了证明它

① 以上皆是（广义的）印地语文学史上自十二、三世纪到十七、八世纪中重要的诗人。金德·伯勒达伊、维德亚伯蒂、苏尔达斯和杜勒西达斯见九页译者注。格比尔达斯是十五世纪人，其主要作品是格言诗。加耶西是十六世纪人，其主要作品是长篇叙事诗《伯德马沃德》。米拉·巴伊是十七世纪的女诗人，其作品大都是歌颂黑天的抒情诗。格谢沃达斯是十七世纪的诗人兼文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叙事诗《罗摩之光》，他的文学理论有《诗人所爱》，属于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著作。普生和默蒂拉默是两兄弟，是十七世纪人，前者写了雄壮的颂歌，后者写了大量的情诗。比哈利也是十七——十八世纪诗人，作品有《七百首诗集》，大多是写艳情。德沃是十八世纪的诗人，作品很多，同样是写艳情。伯德马格尔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其主要作品有《世界之欢乐》，克那南德是十八世纪人，作品很多，大多是写男女的团圆和离别，也属艳情诗人。勒德那格尔是在1932年才去世的最后一个有名的用伯勒杰语写诗的诗人，现已出版了他的《勒德那格尔诗集》。——译者注

的古老和流传的广泛，出现了种种论调。这些论调最后竟使得我们的历史的眼光变得很狭隘，但是我们始终觉得这种辩护的方法是教族主义的。应该明确的是：印地语（克利方言）并不是靠什么人力成为国语的^①，而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性和作为德里附近的语言的缘故。如果代替克利方言作为德里的传统语言的是纳瓦利语、阿斯米亚语、伯哈利语或马拉雅兰语的话，那么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它也会成为国语。克利方言的波斯体乌尔都语没有能成为国语，首先是因为当莫卧儿王朝一崩溃，历史的偶然性就不再在它那方面了；另外，这种文体和印度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关系并没有能象梵文体的克利方言印地语那样密切。现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争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国家已经同意克利方言印地语作为国语了。因而，文学史专家们至少应该消除害怕文学史显得微不足道的情绪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用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和编写印地语文学史。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克利方言印地语的文学，就是国语印地语的文学，因为印地语的这种形式已经为印度宪法所承认，拉杰斯坦语、迈提里语、伯勒杰语或阿沃提语等语言形式不是国语的形式。因此，国语印地语的文学，不管多么丰富或微不足道，它仍然是克利方言印地语的那些文学。国语印地语的丰富和发展的前途有赖于克利方言印地语的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在我们看来，印地语文学史中只应该包括用克利方言创作

① 印地语（克利方言）是俱卢地区（默勒特——德里）的传统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数比起说伯勒杰语、阿沃提语、拉杰斯坦语、婆杰布利语或迈提里语的要少，大约和说乌尔都语的差不多。德里、阿里加、阿格拉、勒克瑙、阿拉哈巴、巴特那、贝拿勒斯、加尔各答、孟买、那格布尔、杰伯勒布尔、海德拉巴（南部）等都曾经是印地语的中心，也曾经是乌尔都语的中心。因为在穆斯林统治时期或者是莫卧儿王朝崩溃的时候，一些商人或公职人员到这些城市定居了下来。随着他们的定居，克利方言（初期是乌尔都语）也在这些城市中流传开来。但是，这些城市和其附近广大农村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说自己古老的传统的语言。——原注

的印地语文学作品，而不应该包括印地语系中其他语言的文学。

仅仅这样作还不够，我们认为目前应该开始用三种方式来编写和研究文学史。现在印地语系的每一种语言的中心地区，几乎都已经建立了大学，有几所大学还开始了本地区的传统语言和方言的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可是主要是这些大学的印地语系科从克利方言印地语的角度出发，鼓励开展这种研究。大多数人的努力也仅仅局限于探索和搜集民歌和民间传说。今天，诗人们还在用这些语言作诗，而且创作非诗体文学作品的前景也还可以促其实现，在这方面这些大学的印地语系科却没有作任何努力。结果，现代的许多诗人在印地语文学史上连名字也没有。可是这些语言并不是已经死去的语言，依靠说这些语言的人民的血汗办起来的这些大学和其印地语系科，它们有义务在使印地语文学走向繁荣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本地区的传统语言，要促使对这些语言的文学史作广泛的研究。如果印地语系科不能满足这种需要，那么各个大学在各自的地区单独开设地方性语言系科就不应该持有异议。比如，在阿格拉大学和阿里加大学开设伯勒杰语系科，勒克瑙大学开设阿沃提语系科等。研究生应该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谁愿意，谁就可以用纯粹地方性语言的非诗体来写自己的语言史的论文，也可以用克利方言印地语写。从这些语言历史上的俗语时期起直到现在为止，凡是写下来的或口口相传下来的文学作品，都应汇编成集，应该研究文学的各种倾向的发展过程，应该按时期顺序全面清理文学创作中广泛开展和衰落的情况，从而能够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解到，某一种语言中由于哪些内外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条件的结合，文学创作的潮流有时很快高涨，有时却变得缓慢和枯竭，而今天如何鼓励用这种语言进行现代文学的创作。这样，当研究和编写了印度北部、中部各种不同语言和方言的系统的文学史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说任何语言的人都不会感到受